

大家“小”事 学者担当

——访著名财政学者、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

● 本刊记者 阮 静



丛树海,经济学博士,财政学教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任:

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财政学,社会保障学。

见到丛树海教授是在一个高校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注意到他是当天唯一一个通过 PPT 展示做主题发言的专家,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做了两场报告的学者,笔者采访到他时已是晚上。然而丛教授依然精力充沛、耐心谦和地接受采访近两个小时,让笔者由衷地感激且佩服,丛教授却笑言:“当老师的,没这点功底怎么行。”

老师,这一自始至终在丛树海教授心中神圣且热爱的职业,在笔者有幸聆听其两场学术报告和近距离交流两个小时后,更加了解“学者”“师者”这一身份内涵,以至于让笔者几乎忘记丛教授另外一个让人给予更多关注的身份——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而丛教授本人似乎也在故意“隐”去自己这一头衔,在其递给笔者的名片上只有简洁的“教授、博士”的身份介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参加学术会议和作学术报告的时候与我党

委书记的身份没有任何联系”。

丛树海教授,我国著名财政学者,在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支出管理和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颇有建树,1957 年生于上海市,1974 年参加工作,1979 年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1983 年起留校任教,至今在上海财经大学这方土地上耕耘收获。笔者有幸专访了丛树海教授,了解到大家背后奋斗历程中的点滴小事,探寻到一个知识分子为学为师的责任担当。

高考前的初展锋芒

“我们这代人与现在三四十岁的那批年富力强的青年骨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经历更复杂一些,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既了解经历了一些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又最终赶上改革开放大潮,赶上高等教育恢复,抓住了这样一个转瞬即逝的尾巴”,丛树海教授谈及个人经历时,这样讲道。改革开放、高考恢复,是他们



这代人人生轨迹改变的重要转折点,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通道很少,高考的恢复便成为多数人转变生存环境、力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丛教授有所不同的是,在高考恢复前已经有一份在旁人看来算是很“体面”的职业了——上海外贸系统外运公司职工,在其决定高考后也有人这样劝说他“读书无非是为了找个好工作,目前单位已经不错且读大学后的职业未必比这个好”,然而丛教授依然选择高考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有自己主观确实喜欢读书继而抉择的一面,也有‘历史’的一剂催化剂。”

1974年,丛树海教授参加工作。“我比较幸运地分配到了外贸系统的一个单位,上海外运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基层跟工人一起扛大包做了半年苦力之后便被调至会计科做了五年多的会计直到79年高考”,丛教授说道,“我其实78年就想考,但这一年我参加了上海外贸局系统为期一年的会计人员培训班,在此期间不允许高考,但这一年的培训我还是收获颇丰的”,而此前他所说的“历史”上的一剂“催化剂”便与这一年的学习息息相关。

当时,丛教授从基层单位考到了上海市外贸局组织的这一培训班,学员都是外贸局分局各专业公司的会计人员,培训班系统教授了中英文、国际贸易等知识并重点培训了会计专业知识,在当年结业大考中,丛教授会计成绩全班第一名,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因为当时很多学员都已经七八年甚至十多年的会计从业经历,而我只做了三四年

会计且来自一个较小的基层单位,所以起初我各方面并不占优势”,丛教授回忆道,“但也正因为我的单位小,会计科人少,让我在三四年的从业经历中接触到大部分会计岗位,与分工相对细致、来自大单位且常年只做某项具体事务或只记一、二本账的会计相比,我对会计工作有更为全面整体的认知,在强调综合知识运用的学习过程中,我反而占优了。”一方面,丛教授在工作中已经积累了扎实的会计功底,是单位师傅眼中有望成为优秀会计人员的苗子,另一方面,培训班教授会计的老师是上海外贸局人称“老法师”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老法师”是上海话中对于资深且业务能力很强的人的一种称谓),由于当时单位会计记账法普遍采用增减法,而这位“老法师”预见到增减法终将被淘汰、会计记账法终将与国际接轨运用借贷法,所以在教授学员增减法的同时“老法师”更是以教授借贷法为重要补充,由于两种方法平衡原理、记账原理的差异,很多学员并未真正学通学懂,“但是我认为我搞懂了,并且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师在点评时说是硬扣了我两分,因为在他那里没有一百分,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原则性错误,我的自信心也就从这里开始慢慢建立起来了”,丛教授如学生般虔诚地讲述道。而这一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丛教授树立信



心的同时也让他在单位“出了名”。

在这年培训班的暑期实习过程中,丛教授被分到某进出口公司,他在为期一个月的实习中竟然发现了这家单位会计处理中的一项错误:“实习期间不可能让我们去做账,而是把上半年已经做过的账簿拿给我们看,有一天我发现已经装订好的记账凭证有问题,与我的理解有出入。开始我不敢相信,认为会计做出来的东西一般不会出错,更不敢相信这么一家大公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经过反复琢磨以及回家找出书本仔细研究后确认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便鼓足勇气找到了该单位的科长”,丛教授讲述这段经历时颇细致入微,“起初这位科长头都不抬起来回答我说‘不可能’,看我一再坚持的情况下就问‘哪笔账’。他到底是行家啊,拿到手一看、后面凭证一翻,‘刷’一下脸色就变了,立马叫来下面分管的负责人训斥一顿,对我的态度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特别客气特别温和。”丛教授的讲述把笔者也带入到当时的场景,如听一段精彩的故事般期待了解这段经历的结果,“这件事情后来就传开了,在培训班结业分配时原则上我们都应该回原单位,但我实习的这家公司专门派人到我的单位协商把我调过去,不仅如此上海外贸局的财务处处长也专门到我单位同领导商量想让我去局财务处工作,这样我在单位也有名了。”可这种“成名”的代价就是单位党委专门开会研究得出的结论:坚决不放人——

“那时候我很期待去外贸局财务处,因为长期在基层单位的我,虽然刚刚调至公司会计科工作,但当时对我而言,局财务处高不可攀,很敬仰的,结果却是把我硬留在原单位,我就很不高兴”,正是在这件事的刺激下,当年的丛教授便做出了考大学的决定,此时已经是1979年的5月份,距离这一年的高

考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从做会计到“不愿”学会计

尽管在那样一个恢复高考的年代,如同一个闸口被拉开,积压了十多年的知识青年纷纷报考大学,且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显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故如此看来,当时单位不错、个人在岗位上也做出一定成绩的丛树海教授选择高考多少让人觉得机会成本有点大,丛教授本人也说“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是出于一种年轻人很冲动的心态:你不让我走我偏要离开,其实不太理智”,可一旦决定进大学深造,丛教授便全力以赴备战高考、争分夺秒地拼命复习:上下班的公交车上、两三点的深夜都在看书,直至考前两星期才请假在家专心复习,“幸运的是考试结果还算不错”,丛教授说道,“在能够填报三个学校的情况下我填报了同一个学校——上海财经大学”,这种不留后路的做法颇让人有些不解,可更让人觉得意外的是,在当时能够填报六个专业志愿的情况下丛教授竟然一个也没有选择他所擅长的专业、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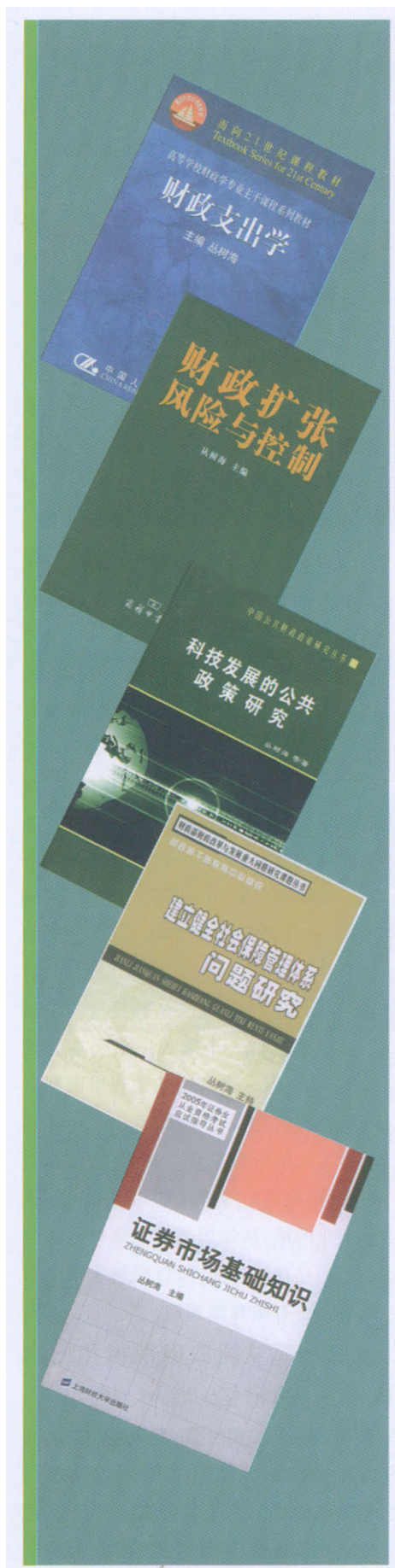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两重因素,一是那时候年轻有些傲气,觉得自己会计懂得比较多,想了学些其他东西,其实这正是没有真正懂的表现;另外就是五年多下来觉得会计是一项重复性的工作,除了单位里对经营管理问题做财务分析的一两个‘老法师’的工作有些技术含量,就我理解的大部分会计工作缺乏技术含量,我不希望自己再做会计便不愿再学这个专业”,丛教授向笔者解释道,并说自己第一志愿就选择了财政学专业,于是也就过渡到笔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何首选财政学?而丛教授给出的答案很有意思,真实且颇具个人特色:“说实话,连财政学是具体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对于财政的一个感性判断还是

基于企业的经历。在我原来做会计的时候就发现联系每个单位的财政专管员很厉害很牛气,一方面财政专管员到单位来都是科长有时甚至是厂长副厂长这些领导在接待,感觉一个普通的财政专管员地位好像很高;另一方面其谈论话题的层次也很高,关乎国家政策,对于很多问题专管员也给我很懂很精通的印象,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学我并不了解,但感觉上一个普通的财政专管员比一个普通的财会人员要厉害。就是在单位从财政专管员身上对财政有那么一点直观粗浅的理解,所以就选择了财政学,说起来有些可笑也很有偶然性。”

然而个人选择的偶然性最终引领了个人的长期发展——高考的选择必然改变着人生轨迹,专业的选择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事业的内容。丛教授认为当自己真正走近财政学,反而有兴趣了,“越学越喜欢”,也就不难理解后来丛教授在财政领域的深耕细作、在财政学界的崭露头角。而回头来看这段企业会计从业经历对于丛教授后来个人的发展不仅有那么一点“导火索”的意味,也从某种意义上奠定基础、埋下伏线。“企业经历、会计功底对我学习财政还是大有裨益的”,丛教授这样总结道,“虽然看似一个微观一个宏观并无多大关联,但一个事物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其实存在相通性、有一个整体和个体之间的衔接关系,真正学好财政、税收、国家理财等等这些知识如果不了解企业的话,从知识架构到理解问题层面都是存在缺陷的,所以理解宏观的东西必然要有微观做基础。”

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和一本《辞海》的记忆

在四十二英寸高清液晶电视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当下,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可谓“老古董”了,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却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而当年



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丛树海教授却获得了这一“奢侈”奖励,用丛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是个“值得回忆的经历”。

当时上海财经大学从财政和金融专业的两个班级抽调十人参与上海电视机行业的调研实习,丛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在做完电视机生产规划和行业调查后,十人被分成三组到三个电视机生产厂做为期一个月的具体调查,丛教授当时去的是飞跃牌电视机的生产厂即上无十八厂(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实习结束后丛教授主动为该厂撰写了一份报告,“当时企业刚好向社会征集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的建议,而我在实习期间也确实发现一些问题就撰写了这样一份报告”,丛教授说道,一方面他就该厂的生产现状做出分析,指出该厂成本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另一方面他对该厂单线式的生产管理流程提出质疑:“整个生产流程直到最后一道程序都是按照流水线来设计,我就发现这种形式的管理有一个缺点,即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出现断裂的时候都会影响最终的一个环节,且环节越多、出现问题的概率就越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后面的总产出就会受影响。”质疑过后,丛教授有针对性地给该厂提出改革方案:“其实就是对其生产做出分类后,把单线式的流程改成一个用电路上的说法叫并联电路,相当于一个是串联电路改成一个并联电路”,丛教授说道。这种电路式的解释对听者来讲易于理解,但可以想见的是作为当年电视机行销全国的上无十八厂,其生产管理流程绝非串并联电路那样简单。丛教授的这一改革方案终获该厂的肯定,奖励其一台当时市场售价大概四百四十多元的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并且这件事在电视上滚动播出,在当年的上海也轰动一时。

“只能说是赢得了一次荣誉,既为学校争得了一次荣誉也为我自己争得

了一次荣誉、树立了信心,感觉我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是可以做点事情的”,丛教授这样点评到自己的这次经历。

学者做学问固然重要,但“学以致用”,把学问转化成为一种“生产力”似乎是学者天然的一种使命与担当,这不仅仅需要知识的融会贯通,且对于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这方面丛教授在大二时的这一经历似乎也在为“学以致用”做出注解,日后这一理念也无形中渗透在丛教授的治学经历和治校办学理念中。当然,这对于当下在象牙塔中苦读的学子也是有着借鉴意义的,即:知识是活的。

知识是活的。对知识愈加灵活的运用必然伴随着学问的日渐精进。读硕士期间丛教授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便在上海市的一个征文活动中获得特等奖,“那是研究所有制问题的一篇论文”,特等奖的奖励是一本《辞海》,“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重的奖了”。但真正给予丛教授肯定的还不仅仅是这一奖励,这篇文章后来全文刊发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世界经济导报》上,“这又给我增加了信心”,丛教授说道,“所以在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有这样两次证明我自己、给我激励、认可我的研究和能力的机会,对我个人自信心的树立以及对知识进一步钻研的鼓励很大。”

其实读研之前,丛教授是有着其他就业选择的。大二时那次实习经历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丛教授本科毕业,当时上无十八厂派人到学校提出给丛教授一个计划科副科长的位置,照理说电视机行业在当年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成长性,且上无十八厂生产的是行销全国的名牌电器,这样一个位置是颇具吸引力的,然而当被系领导问及就业意愿时,丛教授的回答还是坚决无比:“我不去,单位再好我也不去,如果我愿意去这样一个单位的话,我就不来考大学

了。”当然此时已知丛教授决定继续做学问的选择,至于原因丛教授的表达很简单很直接也很坚定:“我其实读了书以后就越来越想读书了,就根本不考虑其他的就业机会,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老师,老师是很崇高的”。

本科毕业留校,一边当老师一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丛教授从此开始了他所说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学者生涯。

“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多做点事”

积累与创新,应该是一个学者治学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没有知识的深耕细作就难以培养起洞见力,就更加难以完成有建设性和推动力的学术创新。而这种深耕细作一方面源自个人坚定的信念和做学问持之以恒的主观能动性,也要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治学氛围,亦即深耕细作的肥沃土壤。丛树海教授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始于1917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中国第一所研究商学之最高学府,虽几经停办、复校,但“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学术传统经由一代代上财人传承下来。丛教授学成于斯,无疑也是这一近百年文化传统积淀教育的受益者之一。

本科时由于刚刚复校,丛教授就在走廊上的简陋“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书籍期刊,几年的积累光读书笔记的卡片做了就有1000多张,“虽然很难说直接获得了多少知识,但是我觉得知识的融会贯通以及整个积累的过程还是很重要的”。硕士阶段,丛教授师从苏挺教授,国内社会主义财政研究名家,解放初期曾在华东财政部工作;博士阶段,师从席克正教授,外国财政专家,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十年代曾代表国家财政部出任联合国世界银行中方董事。不仅如此,研究生阶段的英语老师和经济学老师皆为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外国教授,所用教材

皆为英文原版,“读财政学的时候我们席老师(席克正教授)指定三本英文原著要求我们必须读完,不读是不行的”,丛教授回忆道,开阔的视野眼界、先进的教学理念与严谨的学术传统影响下的丛教授也在治学道路上不断夯实着自己的知识架构、完善着自身的学术积累。

“对我个人而言,学术发展的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谈及个人学术意义时丛教授说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丛教授提交了两篇研究财政支出问题的论

《公共支出分析》、《公共支出评价》、《财政支出学》和《财政扩张风险与控制》等一系列著作,而在研究财政支出问题过程中,丛教授日益感受到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性,在“民生财政”尚未明确提出、社保开支不受重点关注的九十年代初,丛教授认为社会保障既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学术研究问题,亦是财政支出结构中关乎社会民生的一个重要命题,故而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丛教授进一步研究社保问题,搭建起了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恰逢我国一轮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在上海财经大学校董会上致欢迎辞



上财“211”工程三期建设交流汇报



在会计学院调研

文并全部收录在当时由陈共教授和另外一位学者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是当年为数不多的被收录两篇文章的学者,“因为陈共教授认为财政支出问题很重要而研究者少,他收录我的两篇论文一方面肯定我对支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意在引导更多的人研究支出问题。”于是自二十年前丛教授就开始了对财政支出问题的“深耕细作”,因此也就有了

丛教授于1996年出版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在社会保障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很多高校的参考书目;近年来丛教授提出建立“三个支柱”代替“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以大病保障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等观点亦为解决社保领域的实际问题不断发声建言。当被笔者问及对当前年轻人做学术研究有何建议时,丛教授这样说道:“甘

于坐冷板凳似乎有点讲大话,但若不甘于坐冷板凳大概是不会做好学问的;另外年轻学者在积累过程中要尽早集中在某一优势领域或者感兴趣的领域做持续深入的研究,兴趣很重要,有了兴趣再坐冷板凳是不会觉得苦的。”

而在学术研究上笔者也有自己一直以来所持的一种观点:真正的学术成就非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人建树,通过团队建设深化学术研究亦能彰显个人学术价值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当天笔者有幸聆听到的丛教授

丛教授及其团队却以清醒反思的态度不断致力于厘清财政相关基本问题,这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学术想法。丛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财政本身的研究对象就是要清晰,而且这个清晰不是要照搬西方而关键在于适应中国。说公共财政只是意在强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财政由过去建设性财政到当下经历的属性改变,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就是适应这种改变的中国财政框架体系的本原,于是便探索出这样四条财政研究主线,也就相应地对着框架组建了一个个团队不断去跟踪研



的第一场题为《君子爱财,取之有度》的学术报告更多地阐释出其“适度控制政府收入规模、合理使用财政收入超GDP增长部分”等个人的学术思考,那么另外一场题为《构筑中国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报告则让笔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丛教授所带领的一个个优秀精干的财政学科团队的集体学术智慧。在那场报告中,丛教授不仅旗帜鲜明地亮出构建以“发展财政、民生财政、法制财政、绩效财政”为主线和核心内容的公共财政研究框架,并且毫无保留地向听者展示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者围绕这一框架在一个个具体领域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笔者好奇的是,在改革话题不断升温的当下,

究,并且在我们理解中这一框架也已经超出一个学术体系范畴,因为法制、绩效、民主理财等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那里,因此我想我们构建的这一框架亦不失为是一个工作体系、实践体系。”

当丛教授说出这番话时笔者不禁想到上海财大建校初期提出的“治商业学科者,不独贵具书本之学识,犹贵具实际之常识”的办学原则,不难看出,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服务社会发展已经深植在上财的学术研究习惯中,影响着其中的每个人。而当被笔者问及对于团队建设有怎样的心得和规划时,丛教授的回答中显然透露出更多的自信与自豪——“我们的团队人不多但研究领域分布

相对均衡,团队建设一方面得益于各个领军人物的带领以及年轻骨干的成长,更为可贵的是我们的团队力量集中、非常团结,不同观点、任何想法都能够一起沟通研究,所以我们的团队非常好,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多做点事。”

——“如何定义您所说的‘多做点事’”?笔者追问。

——“做点大事,一方面希望在学术上、财政学的基础工作上做点事情、留下点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对国家的重大事项有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包括《预算法》的问题、透明度的问题以及现在已经做出影响力的‘营改增’的问题等,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够进一步有所建树。”丛教授说道。

勿需多言,“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多做点事”、“做点大事”,这份朴素有力的学者担当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上财情”

上海财经大学九十余年的建校历史,丛树海教授便已躬耕于此三十余年,见证了学校发展历程的三分之一,可谓其个人发展已与学校发展融为一体,“我从79年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就一直没离开过,对学校的感情是非常深的”,笔者理解的这种深沉的感情与丛教授对于恩师的景仰、学校文化传统的认同等密不可分,也正基于此,丛教授一路在这方土壤深耕下去,随着时间的积淀焕发出更多个人的坚守与眷恋,以及更多超出个人的责任与担当。

源于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科和上海财经大学,为适应商学人才培养、造就高等商业人才,迁址作为当时中国经济与金融、商业中心的

上海,于1921年成立上海商科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商科学府,1923-1924学年期间,上海商科大学16名教员中,直接聘请了4名外国教员,还有多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外名校,“这就是最初的教师结构,即我们最初办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化、开放性的教学团队,直到我的导师这一辈”,丛教授颇显激动地向笔者介绍。与丛教授的博士生导师席克正教授在上财共同开创西方财政学教学和研究的曹立瀛教授、王传曾教授,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博士、一位早年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我们曹立瀛老师不光是数理统计博士,另外在美国还拿到数学硕士、文学硕士,并懂六门外语,一生创作了大量古典格律诗词、语体诗及英法文诗,这种学贯中西的功底是我们这代人难以超越的”,丛教授感慨道,而在上财漫长的发展岁月中,马寅初、孙冶方、黄炎培、严济慈等名师大家皆曾执教于此。

国际化的教学背景,大师奠定的学术根基,塑造着上海财经大学颇具“国际范儿”的办学特色,亦潜移默化着每个身在其中的学子、教师。88年起走上行政岗位、逐步从院系领导走向学校核心管理层的丛教授也在不断传承着这一办学理念,“89年时我已经担任财政教研室主任,在我老师的影响下,自那时起我们就注意吸收外国教材,在本科

生教学中开始使用罗森的《财政学》第二版原版”;而此后,上海财大国际化的步伐亦是有目共睹——2003年,上财首次引进海外华人学者担任院长,为学校发展注入国际化新鲜血液;2005年,上财首推“常任轨”教师管理制度,成批量成建制地引进海归博士;而对标“伦敦经济学院”、“一桥大学”,把上财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水准、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学更是几代上财领导班子的追求。“所以回过头来讲,国际化其实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传统,而内涵发展、致力于求质量做精品则是我们自始至终发自内心的需求”,丛教授这样总结道。也正是与上财几十年的发展如此“同命运、共呼吸”,当被问及如何从老师走向行政岗位,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以及接下来的期许时,丛教授这样说道:

“我从上海财大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路走来,当组织跟我谈、要求我为学校工作、做贡献的时候,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学校培养了我,我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是义不容辞的,有外调其他单位和学校的机会都被我拒绝了,但自己学校要求就是没有理由拒绝,即使要个人放弃很多东西来为学校多做点事情,所以有这样一个情结在,当了学校领导后也就更不能讲自己。目前的想法就是尽心服务,校长也好,书记也好,领导的只是一个组织,组织中教授在发挥作用,而一个学校的水平正是体现在一个个教授身上,因此要保证教授有充

分的发言权,尽心为老师服务、以学术为重。”

可能这就是传统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超出个人的责任与担当,而丛教授讲述的个人经历中面临选择的另外一个小插曲似乎更意味深长:九十年代中期曾任上海财大证券期货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的丛教授有多次转行去证券金融业的机会,且对方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条件,远远高于当年在学校每月千余元的工资水平,不可谓不诱惑。丛教授说自己至今也不明白当初为何没有去,“其实我还是喜欢学校的氛围,讲到底是‘喜欢’留住了我,你让我给出其他解释我也解释不出来”,而在这次选择面前丛教授的夫人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她没给我施加任何压力,全力支持我的决定,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决定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学校,从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现在后悔了吗”?

——“不后悔,既然选择了当老师……其实当老师也是有它的乐趣的。当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学生或者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时候,那种满足感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也许就是那“剪不断、理还乱”、愈加深厚的母校情结让丛树海教授一次又一次担当起上财学者的使命,为这所近百年的老校一年又一年尽心尽力服务。■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

记者手记:

采访丛树海教授给我的感受是其开诚布公、侃侃而谈、平易近人、毫无保留,全然没有我想象中“大家”的架子,然而写作中却有了那么一点“矛盾”,一是其个人经历与上海财经大学的传统与发展“难分难舍”,另外一个就是其师者学者的身份亦与其多年从事院、校管理事务的理念“纠葛不清”;一旦谈及为师为学心得他便去思考应如何给老师更好的保障让其安心做好学问、如何让学校的发展更上一层楼等等,这对力求清晰的写作过程产生了一定阻力。然而正是这种“矛盾”让我写作了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上财情”,至少在我看来他是最有资格谈“上财”的学者之一,也正是这种“矛盾”让我不禁在想:若干年后当我们再来访谈丛教授以及像丛教授这样为一个学校发展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的学者时,可能在其名字前还要冠之以另外一个身份——教育学家。他们以学者的担当必将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留下足迹。